

宋代文化研究專輯

唐宋文學研究

——
曾棗莊文存之二



巴蜀書社

曾棗莊文存之二

唐宋文學研究

曾棗莊

巴蜀書社

責任編輯：李衛紅

封面設計：尹 波

版式設計：王蓉貴

唐宋文學研究

——曾棗莊文存之二

曾棗莊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125

字數 340 千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 7—80659—010—2/I·425

定價：96.00 圓(一、二卷)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青年时代作者夫妇



1998年与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



1984年和美国高级进修生唐凯琳博士(中)



1999年和日本高级进修生松田佳子
博士(左)、池泽滋子博士(右)

自序

我從初中起就愛好文學，喜歡背誦古典詩詞，一心想讀中文系，整個高中階段從未動搖過。但在高考前幾天，全部計劃都打亂了。那是 1956 年，中國人民大學于統考前在全國單獨招生，老師、同學都慫恿我去報考，我于是抱着“練兵”的目的報了名。那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沒有中文系，而新聞系只招新聞工作者，不招收中學生，我沒有資格報考。于是，隨便報了個歷史系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反正考上的希望極小，也沒有打算考上。正因為如此，在考《中國歷史》時，除答題外，我還花了不少時間去對其中的一道題提了一大堆意見。沒有料到居然錄取了，而且不準再參加統考。我就這樣失去了讀中文系的機會，稀裏糊塗地考上了以前連名字都未聽說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當時的人大歷史系有兩個專業，之所以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是因為另一專業為中共黨史，覺得內容太少，故選了範圍大一些的，這也說明我對這些專業一無所知。

上大學後的第一年，我仍戀戀于文學，曾想轉到新聞系，未成功。一天偶然讀到朱生豪翻譯的《羅密歐與朱利葉》，對莎士比亞產生了興趣，于是花了一年的課餘時間來讀莎士比亞的全部劇本。青年人的愛好是容易改變的，由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是從空想社會主義講起的，我很快對各式各樣的烏托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西方莫爾的《烏托邦》到梅葉的《遺書》，從中國《禮記·禮運》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凡是我找得到的烏托邦資料，都找來讀，並作了詳盡的筆記。我深深感到要實現人類的理

想實在太難，莫說儒家的大同理想始終是空想，就是墨家的衣能蔽體，食能果腹，標準極低的理想，人類至今也未完全實現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理性勝利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現出是對啟蒙學者所作的美好約言的殘酷諷刺，它引起了人們深深的失望。”我感到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不僅對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適用。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政治學、哲學，還繼續研究過一段時間的烏托邦。不久，我這位學馬列主義、教馬列主義的青年却因反對當代中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名，被逐出了大學講壇，先後到中專、中學教語文，沒有條件再研究烏托邦了。但從此我也得到了解脫，又可以憑興趣讀書了，我於是又回到古典文學上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因為讀書愛做筆記，愛寫文章幾乎成了反革命，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等待運動後期處理”時，仍繼續作讀書筆記，繼續寫文章，只是沒有地方發表而已。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寫了《理想與現實》，認為美好的理想產生于醜惡的現實，美好的理想一旦實現，其現實同樣醜惡；寫了《真理與謬誤》，認為今天的真理或許就是明天的謬誤，今天的謬誤或許明天又成了真理。

我貶逐所在地的工農兵中學的校長吳臻伯是當年四川大學四清工作組的成員，對我在川大的情況略知一二。他曾多次對我說：“老曾，你可以繼續寫文章嘛！”我也半開玩笑地回答說：“我早已改邪歸正，洗手不幹了。”後來，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的朱文顯、付昭中兩先生來找吳臻伯組稿，他答應下來，並要我寫。我遵命寫去的文章，很快發表了，就這樣，文化大革命還未革完，我又寫開了。

但我真正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是在1972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出版後。從那以後，我的研究工作大體可分

為三個階段。

一是杜詩研究階段。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的揚李抑杜的鮮明傾向，使我為杜甫大不平，于是開始系統研讀杜詩。也是邊讀邊作筆記，最後整理成一部《杜甫傳》初稿。但當時誰會出版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學語文教師的《杜甫傳》呢？我于是只修改出了《杜甫在四川》部分，一是因為杜甫的現存詩有三分之二作于四川，二是想以地方特色取勝，爭取出版。我把稿子交給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并附了一封酸溜溜的信，希望他們把稿子看完再作決定。感謝當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文學編室主任楊蓀先生，他硬著頭皮讀完全稿，并約我面談，在問明我的寫作意圖和寫作經過，去同總編李致先生商量後，向我宣判：決定出版。就這樣，我的第一部專著《杜甫在四川》于1980年出版了。

二是三蘇研究階段。1975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也批到了蘇軾。罵他是反動派、保守派，未能觸動我，因為我認為這是政治立場問題，立場一變，結論也就不同。罵他是頑固派，也未觸動我，因為頑固也可說是立場堅定，未必是貶詞。但當有人罵蘇軾是動搖的中間派，甚至是典型的投機派時，我就感到無法接受了，因為這是人品問題，而我對蘇軾的人品一向是很敬佩的。天下哪有不元豐不容于元豐，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從不趨炎附勢的投機派呢？我于是開始系統研究蘇軾，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陸續發表了《論蘇軾政治主張的一致性》、《蘇軾〈與滕達道書〉是懺悔書嗎》等系列論文，并于1981年出版了《蘇軾評傳》。其基本觀點是認為蘇軾一生既反對王安石變法，又力主改革，他與王安石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的分歧，不能以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作為評價神宗朝歷史人物的標準。1980年我被調回四川大學中文系，研究條件大為改善，我把蘇軾研究進一步擴大為三蘇研究，又先後出版了《蘇洵評傳》、《蘇轍年譜》、《蘇轍評傳》、《三蘇傳》、《三蘇文藝思想》、《三蘇選集》、《蘇軾詩文詞

選譯》、與人合作箋注了蘇洵的《嘉祐集》、校點了蘇轍的《欒城集》，編纂了《蘇詩彙評》、《蘇詞彙評》、《蘇文彙評》。總之，三蘇研究工作現在仍在繼續進行。

三是編纂大型總集和類書的階段。1984年我被調到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負責，1985年秋開始主持《全宋文》的編纂工作，我只好放棄了原有的研究計劃，把全部精力用于編纂《全宋文》，同全所同仁一起先後起草了《全宋文編纂規劃》以及《全宋文》的《普查工作細則》、《校點工作細則》、《審稿工作細則》、《管理工作細則》，并根據實際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先後起草了十多種補充規定。為了借鑑歷代編纂總集的經驗和教訓，我研究過歷代編纂總集的得失，集體修書的通病等問題，先後寫成了《論總集編纂》、《宋人文集的複雜性》、《〈全宋文〉的文體分類及其編序》、《〈全宋文〉校點工作舉例》等文。經過全所的努力，1993年基本完成了《全宋文》的校點任務，現在審稿任務也全部完成，遺憾的是還不知何時能全部印完。

在大型斷代總集《全宋文》的編纂任務基本完成後，我又承擔了大型類書《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的編纂任務。編纂《中華大典》實際上是幾家地方古籍出版社的老社長倡議的，他們組織全國這方面的專家學者簽名，向中央要求編纂此書，想仿《古今圖書集成》的體例，對我國五四以前的古代文化作全面總結。從醞釀階段開始，我就與聞其事。我當時的思想是比較矛盾的，一方面我覺得五四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終結，現在已過去七八十年，是應該加以總結，作為發展現階段新文化的借鑑，以之昭示子孫，傳播世界。但另一方面，也深感茲事體大，需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現在條件成熟嗎？我如實談了我的矛盾想法，並說與其現在編《中華大典》，不如過些年再說。主張充分利用《古今圖書集成》，把此書的各種索引編好，花錢不多，費時不長，又頗適用。但多數人認為條件已基本成熟，應該編也能够

編。我後來承擔《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的編纂工作，與其說是我自願，勿寧說是一些人事關係促成的。當時程千帆老先生給我來信，邀請我擔任《文學典》副主編和《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主編。程老是我一向尊敬的老前輩，在《全宋文》上給過我很大支持，他要我承擔這一任務，我是不敢推辭的。我承擔任務後，研究了此前《大典》辦公室寄給我的各種材料，研究已試點四年的《隋唐文學分典》的各種資料，按他們已作的規定，具體起草《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編纂細則和編纂規劃，花了半年時間作樣稿。在樣稿通過、全面鋪開後，付出了整整六年的艱辛勞動，于1999年出版。全書一千二百萬字，五大冊，也可算大部頭了。

因編纂大型總集和類書的需要，我的研究範圍也有所擴大。在校點、審訂《全宋文》的過程中，我對一些有興趣的作家，作過一些研究，如夏竦、二宋（宋庠、宋祁）、丁謂、歐陽修、邵雍、范鎮、黃庭堅、陳師道、李之儀、蘇過、晁公遡之類，但往往淺嘗輒止，剛開個頭，又被迫放下。研究得稍稍深入一點的，一是四六文。我在編《全宋文》開始時，就想對宋文作較系統的研究。1993年《全宋文》的校點任務基本完成時，我就開始寫《宋文通論》。宋代四六文是研究宋文的難點，因此，我首先研究宋代四六文。因編《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的干擾，《宋文通論》至今未寫出，倒先寫了一組關於宋四六文的文章，這就是《論宋代四六文》、《風流嬗變，光景常新——論宋代四六文的演變》、《宋代四六創作的理論總結——論宋代四六話》等。二是西崑派，研究宋四六，首先需要研究崑體四六，先後寫有《西崑派的文論主張》、《〈西崑酬唱集〉的思想傾向》、《論西崑派作家群》、《〈西崑酬唱集〉詩人年譜簡編》、《西崑十題》等，並在臺灣麗文出版公司出版有《論西崑體》一書。三是李之儀，先後撰有《李之儀年譜》、《姑溪居士雜考》、《姑溪居士的文藝思想與創

作成就》、《姑溪居士的詞論與詞作》。

以上是我的研究工作的大體情況。因為我寫的有關三蘇研究方面的論文比較多，故把這一部分收在一起，題為《三蘇研究》；杜甫研究、宋代其他作家研究、宋代文學綜合研究等方面的內容，則題為《唐宋文學研究》。我所撰寫的《〈西崑酬唱集〉詩人年譜簡編》、《蘇洵年譜》、《蘇轍年譜》、《李之儀年譜》，已另為《北宋文學家年譜》，于 1999 年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故不再收錄。

我現在身染絕症，研究所所長舒大剛先生決定為我出版論文集，由我自己選，由他雇人為我錄、校，最後又由吳洪澤先生幫我審讀全書，核對引文，花去了他們不少時間，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目 錄

自 序	(1)
-----------	-------

杜甫研究

杜甫在四川的詩歌	(1)
----------------	-------

“百年歌自苦，不見有知音”

——論唐人對杜詩的態度	(19)
-------------------	------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	(35)
-------------------	------

論蘇渙	(50)
-----------	------

宋代作家研究

“二宋”文校理札記	(64)
-----------------	------

論夏竦的文學成就	(73)
----------------	------

宋代理學詩派的鼻祖邵雍	<u>(90)</u>
-------------------	-------------

論歐陽修	(106)
------------	-------

“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

——論蜀公范鎮	(117)
---------------	-------

評蘇黃爭名說	(129)
--------------	-------

陳師道師承關係辨	(145)
----------------	-------

姑溪居士雜考	(159)
--------------	-------

姑溪居士的文藝思想與創作成就	(173)
----------------------	-------

蘇軾與毛滂	(199)
-------------	-------

“客游三十年，不出剡與巴”

——晁公遫及其《嵩山集》	(210)
--------------------	-------

宋代文學綜合研究

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過程	(221)
論元祐體	(236)
從文章辨體看古典散文的研究範圍	(247)
論宋僧詞	(261)
論宋代的言情詩	(275)
論宋代的四六文	(292)
論《西崑酬唱集》的作家群	(336)
《西崑酬唱集》的思想傾向	(352)
《西崑》十題	(383)

附錄

曾棗莊論著目錄	(402)
曾棗莊文存簡介	(409)

杜甫在四川的詩歌^①

安史之亂和個人仕途失意，弄得杜甫走投無路，迫使他不得不入蜀謀生。杜甫自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入蜀，至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正月出川，在四川整整生活了八年（按虛歲算為十年）。他的足跡遍布了四川的東西南北。從760年一月至762年七月和764年七月至765年五月，前後有將近四年的時間在川西，定居于成都，偶爾曾出游新津、青城等地；從762年七月至764年三月，不足兩年的時間，在川北（時稱東川），以梓州（今四川三臺）為中心，先後到過綿州（今綿陽）、射洪、通泉、涪州、鹽亭、漢州（今廣漢）、閬州（今閬中）等地；765年五月，杜甫乘舟沿泯江南下，經川南的嘉州（今樂山）、戎州（今宜賓）、瀘州，然後沿長江東下渝州（今重慶）、忠州（今忠縣）、雲安（今雲陽）、夔州（今奉節），在川東逗留了約兩年半的時間。768年一月，杜甫出川，“偏舟荆楚，竟以寓卒”。在杜甫一生的五十九年中，雖然在四川只有八年，但這是極其重要的八年。大家知道，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從安史之亂（755）到杜甫去世（770）的十五年，是杜甫一生非常重要的十五年；而在這十五年中，杜甫就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生活在四川。流傳至今的杜詩，共有一千四百餘首，其中只有一百多首寫于安史之亂前，其餘全寫于安史之亂後。而現存杜詩竟有近八百首寫于四川，無論

^① 此文為駁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而作，有些提法帶有當時的印迹，作者現在的看法已有改變。

就安史之亂後的現存杜詩講，還是就全部現存杜詩講，都佔一半以上。問題不僅在於數量，更重要的還在於質量。他的許多名篇，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贈花卿》、《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詠懷古迹五首》、《秋興八首》、《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等等，都是在流寓四川期間寫的。在這期間的詩，反映了時代的動亂，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表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他在四川期間，對唐代新興的詩體七律作了精心的研究和大量的實踐，使這種新興詩體臻於完善和成熟。因此，研究杜甫在四川所作的詩歌，是研究整個杜詩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

杜甫在四川的八年是“萬國皆戎馬”（《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的八年。在他入蜀前的三個月，安史之亂的戰火又有擴大，洛陽再度為史思明攻佔：“鄴中事反復，死人如積邱”（《遣興三首》）。入蜀後的每時每刻，他都盼望很快平定安史之亂，以便重返家園。《恨別》一詩集中表現了他這種感情：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司徒指李光弼。他希望李乘上元二年（761）四月河陽之役的勝利，直搗敵人老巢幽燕之地。直至代宗廣德元年（763）春，杜甫的願望纔得以實現，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纔基本平定。杜甫得到這一消息，欣喜若狂，以為可以立即返回故鄉了。他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寫道：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但是，杜甫高興得太早了，北方的戰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安史之亂以來，唐王朝駐守西北的精銳邊兵都調往內地平叛去了，日益強大的吐蕃乘機掠奪土地，西北數十州相繼為吐蕃等少數族攻佔。杜甫是一位很敏感的政治詩人，他在入川前客居秦州（今甘肅天水）時，就聞到了另一場戰亂的火藥味：“西戎外甥國，何得忤天威？”（《秦州雜詩二十首》）西戎即吐蕃。唐太宗曾以文成公主、唐中宗曾以金城公主與吐蕃和親，故吐蕃自稱外甥。現在，外甥起來打舅舅了。廣德元年（763），吐蕃大舉入寇，攻陷長安，代宗倉皇逃往峽州。長安遭到第二次（第一次為安祿山所攻佔）洗劫，吐蕃掠府庫，焚閭舍，一時間，“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尸縱橫”（《釋悶》）。在這些日子裏，杜甫真是心憂如焚，他在《遣憂》中寫道：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
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
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安史之亂後，玄宗逃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感慨道：“吾用張九齡言，不至于此！”郭子儀曾向代宗說：“吐蕃、黨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但沒有引起代宗重視，并把郭子儀閑置不用。後來長安收復，代宗對郭子儀說：“用卿不早，故乃于此！”杜甫所謂“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就是借玄宗以刺代宗。“白馬”指南朝梁武帝降將侯景發動的叛亂，“黃巾”指東漢末黃巾起義，這裏都指吐蕃入寇。杜甫經常把地方軍閥的割據叛亂，少數民族的騷擾和農民起義混為一談，一概斥之為盜賊，這

裏也是這樣。最後兩句是感嘆長安前陷于安史，今陷于吐蕃，太頻繁了！

與此同時，吐蕃對西蜀的騷擾也加劇了。據《通鑑紀事本末·吐蕃入寇》載：“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蕃矣。”杜甫寫了《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紀其事。在這些詩裏，杜甫斥責了吐蕃統治者的背棄和好（“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慨嘆和親無用，這個自稱外甥的吐蕃竟奪取了舅舅的大片土地（“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揭露了吐蕃統治者的種種罪行：出使吐蕃的李之芳被扣留（“骨斷使臣鞍”），將領犧牲很大（“血埋諸將骨”）。戰士銜枚荷戈，像江中枝梗，漂泊無定（“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結果弄得兵疲糧盡，十室九空（“蠶崖餓馬瘦，灌口米船稀”，“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直至廣德二年（764）秋，嚴武第三次入蜀，率兵西征，纔擊敗了吐蕃，解了松州之圍。杜甫稱頌嚴武道：“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在維州）雲間宿，欲奪蓬婆（大雪山）雪外城。”（《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肅宗為了換取回紇幫助他平定安史之亂，先後以寧國公主和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之女與回紇可汗結婚。安史之亂平定後不久，僕固懷恩又反叛，多次引誘回紇、吐蕃等入寇。永泰元年（765）九月，僕固懷恩再次引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等數十萬衆大舉入寇：“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起”（《青絲》）。“青絲白馬”就是以叛將侯景喻僕固懷恩，說他繼吐蕃攻陷長安之後再次卷起了戰爭的風塵。這次叛亂，由于僕固懷恩在進犯途中暴病身亡而失敗了。郭子儀經過分化瓦解，與回紇講和，并共同回擊吐蕃。不久，吐蕃首領贊普亦求和，使者往還，“甥”“舅”又和好了。杜甫對此是高興的：“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但杜甫一貫主張依靠自己力量